

追忆同于蓝阿姨交往的点点滴滴 4



作者在北海舰队
(前右 1968年)

“文革”中母亲被定为“特嫌”、“里通外国”要案而遭受了造反派和公安部门的隔离审查、劳动监管、甚至毒打，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么倔强的她会是日本人，而全家人也被无辜株连了。我也经历了1968年夏从北海舰队被强制退役到内蒙插队，1971年秋又从扎鲁特旗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被迫离职转业；一次次地交出了帽徽、领章甚至配枪而成了那个时代最不被看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前总怕长辈问题株连子女，但当时连我们这代人都得“屏蔽”自己了，在内蒙的五年中我曾三次回京路过熟悉的宝禅寺门前而不入，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不希望连累和影响深陷劫难的于蓝阿姨一家了。

1973年初，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母亲的中国籍证书并回复党籍后，我终于有

机会参加了当年夏天文革中唯一的那次高考并名列前茅。然而张铁生的“白卷”闹剧导致了原定的考试入学被迫改为了推荐入学，尽管所在的扎鲁特旗鼎力推荐自己，但毕竟渴望上学的知青太多了，这也许是我们那批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吧。

那年8月，我曾回京陪着母亲去看望了于蓝阿姨一家，这是她当年“出事”后时隔十年以来的第一次拜访，她太渴望能同好朋友说说心里话了，而那时能成为知己的人却少之又少了。记得当时田方伯伯因为极其压抑与忧虑而卧病在床，于蓝阿姨也在承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和磨难，但他们还是鼓励和安慰仍被视为“内控对象”的母亲以及坎坷中的父亲和我。聊天之中也谈及到了我所面临着入学的困惑，毕竟母亲曾经的问

题会导致推荐的“风险”，于蓝阿姨望着我许久，轻轻地说了声，试试看，咱们一起努力吧。

1973年8月底，在当地领导以及好心人们的帮助下我被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录取了，而就在离开扎鲁特的前夕我收到了一封辗转迟来的信，是刚从监狱中解放出来的全总女工部长乌兰写给我和已经“倒台”了的旗委书记僧格仁钦的，“从于蓝阿姨那里了解到了刘静贞同志（指我母亲）和你的情况后我落泪了，文革中我们都曾经历了苦难与考验，也许帮不上忙但愿意推荐你上学……”，还写道，“你家里的情况比较特殊，今后要走的路还会苦还更长……”老书记遗憾地说信收到得太晚了，但读着那感人至深的文字我还是哽咽了，家里出事后一些曾经熟悉的人选择了回避或远离，然而童年时代的邻居于蓝阿姨、素不相识的老干部乌兰同志以及许多善良的人们却勇敢地站出来了，不论其结局如何至少让我在那个荒蛮无奈的年代里看到了阴霾里那一缕阳光，品尝到了苦难中那一丝甘甜。

1974年暑假，我从长春赶回北京曾一个人去了于蓝阿姨家，但令我惊诧的是

房间里田方伯伯相片竟然镶嵌在黑色镜框里，患了癌症而医治无效的他在那凄风苦雨中刚刚走了，留下了的是心力交瘁的于蓝阿姨。我能够体会到田方伯伯在她心里的分量，在延安结婚时曾誓言相爱相伴到永远……那天我留下了带去的东北山参悄悄地走了，于蓝阿姨不想多说一句话，只希望一个人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守候着。

1978年初，全家人四人四地分割十年后团聚在北京了，母亲哭得好伤心，感慨自己是浩劫中的“幸存者”终于看到了光明而许多熟悉的人却并非那么幸运。其中包括敬重的老领导田方，曾因“母亲问题”病死无辜的爷爷，也还有那位已失

联了几十年却惨遭诬陷“包庇日本女特务”被活活打死了的救命恩人——沈阳人民医院邵淑荣大夫……

而后我们家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亲落实政策调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期间曾多次到中南海担任国家领导人观摩影片时的日语翻译，每每落幕人尽时她总是汗流浹背满目泪花而不愿离去。她后来曾同于蓝阿姨聊过，那时不只是翻译工作中的忐忑不安，也还有信任重归后的百感交集，毕竟曾让她付出了太多也等待了太久太久了。

后来母亲找到了失散了三十六年的亲人，1980年离休后回到了日本。她一边照顾着病重的老人，一



于蓝与田方在莫斯科